

明清时期芜湖关的税收与商品流通

许 檀 徐俊嵩

摘 要: 芜湖关包括户、工二关。工关设于成化七年(1471),户关设于明末,其税额从明代的数万两到清代中叶增至30余万两,最高曾达45万两。在长江沿线各关中仅次于九江,位居第二。经由芜湖关流通的商品以竹木、粮食为最大宗,其次为棉布、棉花、桐油、烟叶、纸张、瓷器、铁器等。来自长江中上游各省的竹木簰把是工关税源之最大宗,占比达60%—80%。粮食也是经由芜湖关东下的大宗商品,其中大豆占有很大比重,每年至少有三二百万石;另外,依据船料税银折算的过关米粮数量则远不如以往的估计,最多不过数百万石。

关键词: 明清时期; 芜湖关; 工关; 户关; 税收; 流通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明清时期华北城市结构与市场层级”(12BZS069)

作者简介: 许檀,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教授(天津 300071);徐俊嵩,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太原 030006)

芜湖地处长江中下游之交,是长江中上游各省与江南地区的水运枢纽。目前所见对该关的研究以制度角度为多,较少利用税关档案;①用档案资料对商品流通的研究仅见廖声丰《清代前期的芜湖榷关及其商品流通》一文,②但比较简略;对税收数据的分析则只有倪玉平《清朝嘉道关税研究》一书中对嘉庆道光两朝的考察。③本文主要利用明代的《芜关榷志》和清代该关税收档案,在前人基础上对明清时期芜湖关的税收与商品流通做进一步的考察。

一、芜湖的户、工二关及其税收额

芜湖,明清两代均为太平府属县。该城位于长江南岸,青弋江、长河在此汇入长江。元代芜湖商业已有较大发展,汪泽民的记载称,邑“当南北之冲,邮传、商贾、舟车之所走集,民聚以蕃”。④明人黄礼记言“芜湖附河距麓,舟车之多,货殖之富,殆与州郡埒。”⑤故政府在此设关榷税。

芜湖工关始于明代的竹木抽分。成化七年因“营建乾清、坤宁二宫,工费浩大”,明政府在此设抽分厂,“将商贩板木堪中者照例抽分……起倩人户,起送赴京听用”。⑥稍后定制“杭州、荆州、太平

① 笔者所见相关论文主要有:王鑫义、周致元《明代芜湖抽分厂述论》,《学术界》1995年第3期;陈联《明清时期的芜湖榷关》,《安徽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廖声丰、黄志繁《清代芜湖关的设置及其管理体制的演变》,《历史档案》2004年第4期;姚国艳《明朝芜湖榷关法制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此外,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和邓亦兵的《清代前期关税制度研究》(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两本专著对该关也有涉及。

② 参见廖声丰《清代前期的芜湖榷关及其商品流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③ 参见倪玉平《清朝嘉道关税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2—75页。

④ 嘉庆《芜湖县志》卷二〇《艺文志》,汪泽民《浦侯去思碑记》,国家图书馆藏民国二年重印本,第11页。

⑤ 嘉庆《芜湖县志》卷一《地理志·风俗》,国家图书馆藏民国二年重印本,第18页。

⑥ 刘洪谟《芜关榷志》卷上,王廷元点校本,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第1页。

(即芜湖)抽分三厂……凡竹木等物每十分抽一分,选中、上等按季送清江、卫河二提举司造船;次等年终运至通州,送器皿厂造器皿,余卖银听用。”因解运不便,后改为折银解部。芜湖抽分厂,初由北京工部都水司差官管理,嘉靖年间改隶南京工部。^①

康熙《太平府志》记载“抽分厂系工部分司,在芜湖县治西,滨于大江。明成化七年设立,工部主事王臣始职其任,主管长江大河竹木之税”。^②其“榷取之课始不过四千两,渐增为一万、二万而及三万七千有奇”;^③正德十年(1515)突破4万两,嘉靖十年(1531)、万历二年(1574)曾达5万两。万历年间该关主事刘洪谟所撰《芜关榷志》记载了正德十年以降该关的抽分税额,我们据以绘制成明代中后期芜湖工关的税收曲线(见图1)。^④图1可见,工关税收波动较大,但大体保持在2万—4万余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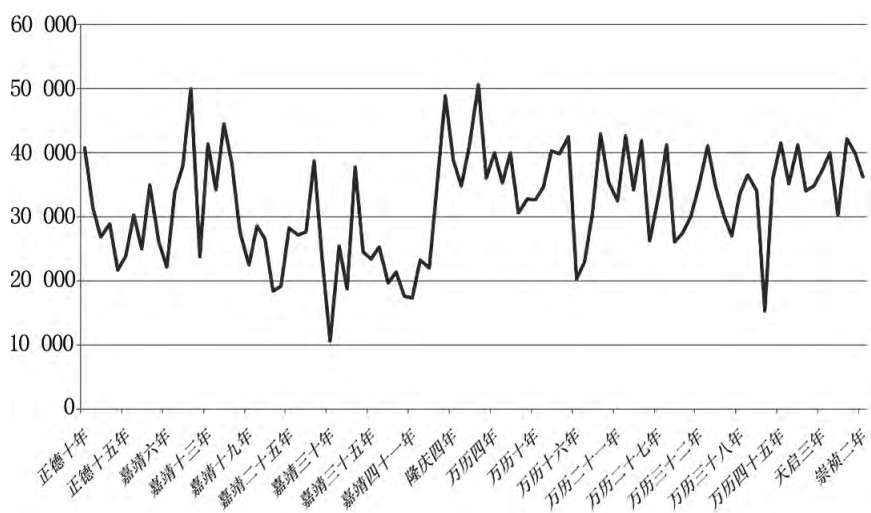


图1 明代中后期芜湖工关抽分税额的变化 单位:两

芜湖户关设于明末,康熙《太平府志》记载“钞关系户部分司,在芜湖县西河南将军港。明崇祯初年南京工(户)部尚书郑三俊建议开设……主管上下客船一切货物等税。”^⑤郑三俊《明史》有传,记此事为“万历时税使四出,芜湖始设关,岁征税六七万,泰昌时已停。至是,度支益绌,科臣解学龙请增天下关税,南京宣课司亦增二万。三俊以为病民,请减其半,以其半征之芜湖坐贾。户部遂派芜湖三万,复设关征商,……遂为永制。芜湖、淮安、杭州三关皆隶南京户部”。^⑥《明实录》崇祯三年五月记有“户部尚书毕自严上言,昨臣部以军饷告绌,议加关税。因查南京宣课司额税仅止一万,题令南部议加二万。南部臣郑三俊谓‘留都所榷皆落地货税,所得无几,惟芜湖密迩南京,扼据上流,凡滇、黔、川、广奇货珍物靡不辐凑于此,商贾倍于南都,而征收不及,是亦不均之事。议于芜湖商贾之货照先年旧例,令赴宣课司报税领单,以凑新增二万之额。’当国家多事时,得此一税,未必非涓滴之助,所当即为允行……其额以三万为率……其银尽解臣部,以充蓟、辽之用……帝悉从之。”^⑦据此可知,户关之设

① 万历《明会典》卷二〇四《抽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024页。《芜关榷志》卷上,第1页。

② 康熙《太平府志》卷一二《田赋下·关税》,国家图书馆藏光绪二十九年重印本,第20页。

③ 康熙《太平府志》卷三六《艺文二》,张秉清《芜关榷司题名记》,第69页。

④ 图1中的税收额,据《芜关榷志》卷上《履历考》第19—27页记载统计,其中不足一年的税额未予收入。又,刘洪谟所撰《芜关榷志》记事到万历三十年,三十年以后的内容为后人增补,见《〈芜关榷志〉提要》。

⑤ 康熙《太平府志》卷一二《田赋下·关税》,第20—21页。

⑥ 《明史》卷二五四《郑三俊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564页。

⑦ 《明实录附录·崇祯长编》卷三四,崇祯三年五月辛丑,台北:台湾“中研院”史语所,1967年,第2024—2025页。

始于万历中,为税使私设,旋即废止;崇祯三年(1630)因军需告绌而复设,定税额为三万两。

《芜关榷志》记有“崇祯八年乙亥(该关)改归北户部主事雷应乾”管理,“年终零九个月课六万九千有奇”,此项税课似应为户、工两关所征。不过,该书所记管关官员八年至十三年为户部主事,十四年至十七年为工部所派,三年至七年则未记所属,所载税课是否均为户、工二关合计尚难确定,暂存以待考。表1为《芜关榷志》所载崇祯三年至十七年的管关官员及所征税课。

表1 崇祯年间芜湖关履任官员及征收税额一览表

年 分	管关官员	征收税银	备 注
崇祯三年	主事赵之绪	52 000 余两	年终课
崇祯四年	高梁楹	41 000 余两	年终课
崇祯五年	主事王思任	38 600 余两	年终课
崇祯六年	主事邵建策	27 000 余两	年终课,天旱缺额
崇祯七年	主事王朝升	49 000 余两	一年零五个月课
崇祯八年	北户部主事雷应乾	69 000 余两	一年零九个月课
崇祯十年	户部主事潘曾玮	53 000 余两	一年零三个月课
崇祯十一年	户部主事陆自岩	61 000 余两	一年零一个月十四日课
崇祯十二年	户部主事李尔育	53 000 余两	十个月课
崇祯十三年	户部主事薛之垣	55 400 余两	十个月十四日课
崇祯十四年	工部员外郎王域	100 800 余两	两年七个月零十一日课
崇祯十六年	工部主事庄枋	62 700 余两	一年零一个月课
崇祯十七年	工部员外郎沈旋卿	2 400 余两	五个月零十五日课
平 均	—	43 100 余两	以 12 个月为一年

资料来源 《芜关榷志》卷上《履历考》第27—28页。

清初芜湖户、工二关仍由户部、工部分别差官,康熙九年(1670)工关归并户关管理,雍正元年(1723)芜湖关税务改由安徽巡抚委地方官兼管。^①

芜湖关于顺治二年(1645)恢复征税。《大清会典》记载:芜湖户关清初定额87 337.8两,顺治十三年增银35 762.2两,康熙二十五年增15 396两,康熙末年又将铜斤水脚银18 423两归入正额,合计为156 919两。^②工关清初定额为33 300两,顺治、康熙年间先后增银12 000两和10 230两,并将铜斤水脚银归入,合计为70 146两。^③两关合计为227 065两,这是芜湖关税的“正额”。

雍正年间,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芜湖关所征税银在“正额”之外出现大量“盈余”。雍正四年分户、工二关共征银26万余两,超出“正额”35 300余两;九年分征银38万余两,“盈余”达16万两。^④“盈余”的增长并非芜湖一关所特有,故乾隆十四年(1749)定制,以雍正十三年分各关所征盈余数额作为定额。乾隆皇帝谕旨如下:

盈余究在正额之外,然非额外别征。盈余缘照额征收,尽收尽解,其溢于成额者即谓之盈余;是名虽盈余,实课帑也,亦即正供也……夫盈余无额而不妨权为之额,朕意当以雍正十三年征收

① 雍正《大清会典》卷五二《户部·关税》,《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7辑第768册,台北: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第3093、3103页。

② 康熙《大清会典》卷三四《户部·关税》,雍正《大清会典》卷五二《户部·关税》,《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2辑第715册,第1597页;第77辑第768册,第3058页。

③ 雍正《大清会典》卷二〇一《工部·抽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7辑第787册,第13541—13542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八册,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安徽巡抚魏廷珍折,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21页;《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二一册,雍正九年八月十七日安徽巡抚程元章折,第55页。

盈余数目为定,其时正诸弊肃清之时,而亦丰约适中之会也。自雍正十三年而上下二三十年之中,岁时殷歉相若也,贾舶之往来相若也,民风之奢俭相若也,则司榷之征收又何至大相悬殊哉。嗣后,正额有缺者仍照定例处分,其各关盈余成数视雍正十三年短少者,该部按所定分数议处。永著为例。^①

雍正十三年分芜湖户关征收盈余银 57 870.345 两,工关为 47 181.935 两,遂以此作为盈余定额。^②正额、盈余合计,户、工二关定额 33 万余两。乾隆四十二年,将盈余考核改为“三年比较”,但实行的结果是盈余额被不断提高,故嘉庆四年(1799)重新确定各关定额。此次定额由嘉庆皇帝亲自酌定,故称“钦定盈余”。芜湖户关“钦定盈余”73 000 两,工关为 47 000 两,两关合计 120 000 两,正额、盈余合计为 34 万余两。^③表 2 是清代前期芜湖户、工二关关税定额的变化,请参见。

表 2 清代前期芜湖户、工二关关税定额变化一览表 (单位:两)

关 别	顺治初年	康熙二十五年	康熙末年	乾隆十四年	嘉庆四年
户 关	87 338	138 496	156 919	214 789	229 919
工 关	33 300	55 530	70 146	117 328	117 146
二关合计	120 638	194 026	227 065	332 117	347 065

资料来源:雍正《大清会典》卷 52《户部·关税》卷 201《工部·抽分》;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 188《户部·关税》;卷 710《工部·关税》。

芜湖户、工二关的实征税银,雍正年间数据不全,乾隆以降则比较完整。图 2 是依据实征税额绘制的乾隆一道光年间芜湖关税的变化曲线,表 3 是对二关实征税额的十年平均统计。^④二者相互参照,可较全面地了解清代中叶该关税额的变化情况。

表 3 乾隆一道光年间芜湖户、工二关实征关税的十年平均统计 (单位:两)

年 代	数据	户 关	工 关	二关合计	备 注
乾隆元至十年分	9/10	257 841	138 125	395 966	二年分缺户、工二关分税额
乾隆十一至二十年分	10	246 705	134 191	380 896	
乾隆二十一至三十年分	10	238 575	125 246	363 821	
乾隆三十一至四十年分	10	231 216	123 931	355 147	
乾隆四十一至五十年分	10	229 682	121 587	351 269	
乾隆五十一至六十年分	10	230 816	109 579	340 395	五年分有两组数据
嘉庆元至十年分	11	230 491	113 056	343 547	
嘉庆十一至二十五年分	15	230 709	117 376	348 085	
道光元至十年分	10	229 097	111 453	340 550	十二年分有两组数据
道光十一至二十年分	11	221 076	101 417	322 493	
道光二十一至三十年分	10	217 565	108 468	326 033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七《征榷考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091页。

② 台湾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辑,乾隆十六年九月初十日安徽巡抚张师载折,台北:台湾故宫博物院,1982年,第623页。

③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八八《户部·关税》;卷七一〇《工部·关税》,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6辑第656册,第8667页;第69辑第689册,第6752页。

④ 图2和表3中的税收数据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该关税收档案汇集整理。清代的税关关期系以12个月为一年,遇有闰月连续计算,故税收“年分”与实际年份不完全对应,并有个别“年分”会出现两个税收数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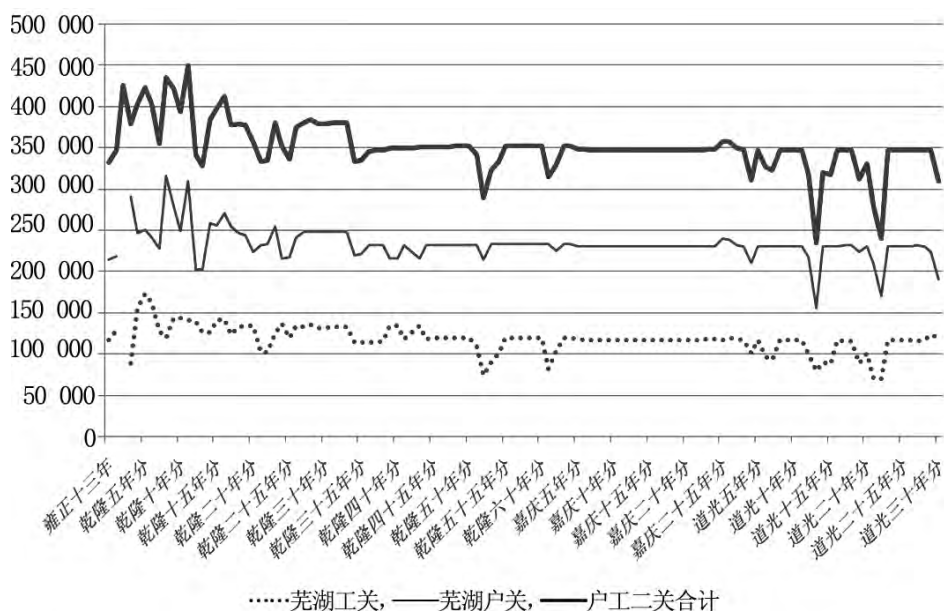


图2 乾隆—道光年间芜湖关实征关税的变化 单位: 两

图2显示,芜湖关的实征税额以乾隆初年为最高,总体呈下降趋势。从雍正十三年到道光三十年(1850)的116年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乾隆前期的三十年税收额最高,但波动较大;其中有8个年分税额超过40万两,十一年分达45万两,是芜湖关税收的最高值;十年平均分别为398 900、380 800和363 800余两(参见表3,下同)。乾隆三十年代至嘉庆末的五十余年税额比较稳定,除个别年分外大体保持在35万两上下;十年平均分别为355 100、351 200、341 300、343 500、348 000余两。道光朝的三十年税额也有较大波动,并进一步下降;十年平均分别为340 500、322 400、326 000余两。其中,道光十三年分是该关税收的最低值,户、工二关仅收银234 914两,缺额112 000余两;其次为道光二十二年分,为240 844两。

户、工二关分别来看,芜湖户关税额大多在22万—25万两,十年平均从25万两下降至21万余两;工关税额多在10万—14万两,十年平均从13万余两降至10万两。不过,二关的峰值和峰谷稍有差异:户关税收以乾隆八年分为最高,达316 189两,其次为十一年分308 833两;其最低值在道光十三年分,仅155 502两,其次为道光二十二年分,170 297两。工关税收以乾隆五、六年分为最高,分别为172 876和161 827两;最低为道光二十一、二十二两年,均只有70 500余两,其次则为乾隆五十二年分的75 154两。

档案记载“芜湖关税全赖下游江、浙地方年岁丰收,货易销售,则上游江楚等省出产诸物商贾源源贩运过关,税自丰盈。”^①即税收的多寡与过关商货数量密切相关,而商货的过关量又受到年景丰歉、运销状况等因素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在下节再做具体考察。至于道光二十一、二十二年分该关税额的大幅下降则与鸦片战争密切相关。道光二十一年分工关仅征收税银70 500余两,缺额46 500余两;户关征银208 900余两,缺额20 900余两。安徽巡抚程楸采奏报其原因称“上年英夷滋事,节次兵船过境,木商观望不前”;而“本年沿江各属民遭水患,诸货滞销,商贾因而裹足”。^②道光二十二年分芜湖关税短绌更甚,户、工二关合计仅征银240 800余两,缺额106 200余两。安徽巡抚奏报称:

①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5辑,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初四日安徽巡抚高晋折,第109页。

② 台湾故宫博物院档案:道光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安徽巡抚程楸采折。

该关应征户、工正额、盈余共银三十四万七千六十五两二钱四分,大半赖川楚、江西货物前赴浙江、江苏仪征、扬州并北五省地方销售。上年夏秋水患,冬季商船不旺;今年春季兵帆络绎,商税又稀。满拟夏秋向称旺月,各省行銷货物,税课尚可补苴。乃四月初旬,乍浦失守,赴浙商船因之甚少;五月继陷宝山,上海赴苏商船亦皆闻风裹足;迨六月上旬镇江失利,金陵戒严,江路梗塞,凡南北一切商船并竹木簰筏俱成绝迹。以每年之旺月直成无税之空关,……此从来未有之事,迥非水患、兵船暂时偏灾可比。^①

乍浦、宝山、镇江接连失守,江路梗塞,往来商船和竹木簰筏绝迹,因而导致芜湖户、工二关税收的大幅度缺失。

以上考察我们看到,清代中叶芜湖关的税额大体在 30 万—40 万两,最高曾达 45 万两。这一数额在长江沿线各关中仅次于九江,排第二位。表 4 是清代中叶长江沿线各关实征关税的比较。^②

表 4 清代中叶长江沿线各关实征关税状况一览表 (单位:万两)

税关名称	实征税额	备 注
九江关	35—70	户部关,但征收竹木税
芜湖关	30—40	户关、工关合计
龙江西新关	18—24	户关、工关合计
夔 关	15—20	户部关,征收粮、杂二税
武昌关	4—6	户部关,只征船料,不征货税
荆 关	2—7	工部关,征收竹木税
辰 关	1.2—2	工部关,征收木税、盐税
渝 关	0.5—0.7	工部关,征收木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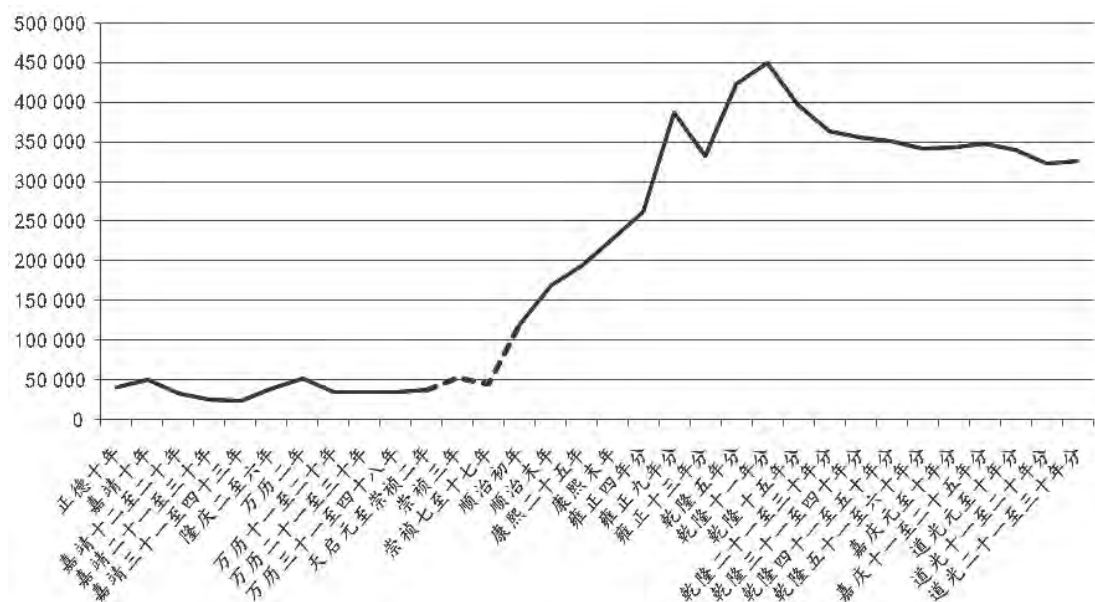


图 3 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芜湖关税额变动趋势示意图 单位: 两

① 台湾故宫博物院档案: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三日安徽巡抚程楙采折。

② 九江关参见许檀《清代前期的九江关及其商品流通》,《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龙江西新关参见许檀、高福美:《清代前期的龙江西新关与南京商业》,《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夔关、武昌关、荆关、辰关、渝关税额请参见廖声丰《清代常关与区域经济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76—381,371—375,368—369和119页。

图3是从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芜湖关税额的变动趋势(见上页)。其中,正德十年至崇祯二年为工关税收;崇祯三年至十七年的数据应是户、工二关合计,但不能确定,故用虚线标出;顺治、康熙为定额数,雍正一道光年间为实征税额。

明代税关很少保留有连续的税收记载,故芜湖关的明代数据尤显珍贵。从正德十年到道光三十年,时间跨度长达300余年,这是目前所见各关中唯一能够把明清两代的税收额衔接起来的例子。虽然明末清初的数据不太准确,但已可以基本显示出这300年间该关税额变动的大致趋势。图3可见,从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芜湖关税额从数万两增至数十万两,即便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其增长幅度仍属可观。其中,康熙至乾隆初年的税额增长迅速,至乾隆十一年分达到最高点,为45万两;此后缓慢下降,但仍保持在30万两以上。

二、经由芜湖关流通的主要商品

芜湖位于长江中下游之交,是长江中上游各省与江南地区商货流通的转运枢纽。经由芜湖关流通的商品以竹木、粮食为大宗,棉布、棉花、桐油、纸张、烟叶、瓷器、铁器等也是税收的重要来源,下面我们分别考察。

(一) 木材竹料

木材竹料是经由芜湖关的最大宗的商品,“工关全赖竹木簾把到关者多,税数方得丰盈”。^①我国的竹木资源主要分布在云贵、川楚、湘赣等省,上游各省所产竹木由长江顺流而下,经重庆、汉口、九江等处到达芜湖;经由芜湖关的竹木大部分会继续沿江东下至南京之上新河,然后分销江南和华北。^②

万历年间的记载称,“楚蜀之木蔽江而下”,停泊芜湖城西之;鲁港侯榷者常“尾衔二十余里”,以至阻塞河道,甚至引起诉讼。^③清代工关税收大幅度增长,过关竹木更多于明代。表5是乾隆年间竹木税在芜湖工关税收中所占比例统计,请参见。

表5 乾隆年间竹木税在芜湖工关税收中所占比例统计 (单位:两)

年 分	工税总额	竹木税	竹木税所占%
乾隆七年分	146 033	121 977	83.5%
乾隆八年分	109 927	88 949	80.9%
乾隆二十八年分	136 296	100 671	73.9%
乾隆二十九年分	131 576	94 225	71.6%
乾隆三十三年分	133 064	97 976	73.6%
乾隆三十四年分	113 759	71 364	62.7%
乾隆三十五年分	113 862	72 061	63.3%

资料来源: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故宫博物院藏该关税收档案统计。

表5可见,竹木税占工关税收的60%—80%,竹木过关量的多寡会直接影响税额盈绌。如乾隆三十三年分芜湖过关簾把621宗,而三十四年分仅242宗,三十五年分为228宗,比三十三年分别少征税银26 600和19 200余两。^④档案记载,“芜关工税盈余全赖上游江楚竹木簾筏过关之多寡定税银之盈绌,至簾筏过关又全赖出产处所雨水及时,运送始无阻滞;行销地方年岁丰稔,货物方易销售。”^⑤

①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8辑,第247页,乾隆十九年闰四月十二日安徽巡抚卫哲治折。

② 参见许檀、高福美《清代前期的龙江西新关与南京商业》。

③ 道光《繁昌县志书》卷一《舆地志·山川》,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115页。

④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乾隆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初七日两江总督高晋折。

⑤ 台湾故宫博物院档案:乾隆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安徽巡抚卫哲治折。

即竹木过关数量受到长江上下游的气候条件、年景丰歉、运销状况以及商人资本周转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如乾隆十四年分,“江西产木地方是年雨泽愆期,溪河浅涸,在山之木不能运达江滨”,是以税银减少。^①乾隆二十九年五月,“正当商人捆扎箬把时候,江广陡发大水,其木植甫经出山,尚未捆成者均致飘零”,以至“较上届少到箬六宗,把一百五十九宗”。^②粮价的上涨影响竹木过关数量,因“做造箬把需夫众多,食用浩繁。如米平工贱则成本轻而贩运多,米昂工贵则成本重而贩运少”。乾隆十七年分“江楚地方米粮价贵”,“商贩皆以工饭倍重,不能获利,贩运者少”,税收较上届减少 18 600 余两。^③

竹木的销售状况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税收。乾隆五十二年分是工关税收最低的年分之一,仅征银 75 154 两,比五十一年分短少 34 100 余两,比五十年分短少 44 600 余两。“究其短绌之故,……乾隆五十年被灾较广,民力艰于兴作,客商旧贩木植堆积难销,无本再行转运,比较上届少到箬把一百二十八宗”。^④道光十三年分也是工关税收较低的年分,仅征收税银 79 412 两,较“钦定盈余”短少 37 734 两。其短征原因:一是连年岁歉,“江南一带民力拮据,不但无力兴造,且多拆屋卖料”,木材销售困难,诸多木商歇业;二是“湖广产木之山又因从前过于砍伐,现植之木尚须培养成材,始可采取,是以大箬更少。”^⑤

将乾隆、道光年间过关箬把数量作一比较,可更清楚地了解竹木过关量对工关税收的影响。表 6 是乾隆、道光年间过关箬把与工关税银对照表,该表可见,乾隆二十年代过关箬把在七八百、五六百宗,三十年代渐降至二百多宗,而道光年间过关箬把多在一百余宗,甚至更少,故工关税收往往征不足额。

表 6 乾隆、道光年间过关竹木箬把与工关税银对照表

乾隆年间	竹木箬把	工关税银	道光年间	竹木箬把	工关税银
乾隆二十四年分	808 宗	136 553 两	道光七年分	一百数十宗	92 571 两
乾隆二十五年分	710 宗	119 483 两	道光十二年分	一百余宗	98 770 两
乾隆二十八年分	695 宗	136 296 两	道光十三年分	? 宗	79 412 两
乾隆二十九年分	530 宗	131 576 两	道光十四年分	80 余宗	91 093 两
乾隆三十三年分	621 宗	133 064 两	道光十五年分	102 宗	87 249 两
乾隆三十四年分	242 宗	113 759 两			
乾隆三十五年分	228 宗	113 862 两			

资料来源: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档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钞档》中该关档案统计。

夹带偷漏也是影响工关税额的原因之一。如道光十六年湖南头、二、三帮漕船 125 只,被查出“例外多带大小木仔二百九十七宗”,照例科算,应征税银 23 118 两零;十七年分,查出湖南漕船例外多带木植,追征税银 15 000 两。^⑥

以上我们考察分析了影响工关税收波动的主要因素,至于乾隆一道光年间该关税额的持续下降,来自贵州、四川等地老林大木的减少当也是重要因素。明代《芜关榷志》所载抽分税则包括江箬,杉

①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 1 辑,乾隆十六年九月三十日两江总督尹继善折,第 822 页。

②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 25 辑,乾隆三十年八月二十二日两江总督尹继善折,第 767—768 页。

③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 8 辑,乾隆十九年闰四月十二日安徽巡抚卫哲治折,第 247 页。

④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 64 辑,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安徽巡抚书麟折,第 685 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道光十四年三月初一日安徽巡抚邓廷桢折。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五日安徽巡抚色卜星额折。

木簰捆、竹簰、川板、楠杂木板等九款。其中,“江簰俱出荆州、辰州,木有楠、杂、青柳不等”;楠木出自湘西之“永顺、保靖二夷司”,青柳木出贵州铜仁府、湖南辰州府。杉木簰,“外江簰来自(江西)饶河或池州”,内河簰系“由徽、宁、池三府各县小河出者”,汇至鲁港、东河;川板,出自贵州镇远、四川綦江、建昌、泸州、夔州等处。^①皖南山区所产木材系顺“小河”而下,没有大簰,经由芜湖关的大宗木材主要来自长江上游各省。万历年间抵关报税者多为“楚蜀之木”,不过,刘洪谟也记载了不少木材产地因采伐过度而“绝产”:“丙子志云,史称巴蜀沃野,地饶竹木,又曰南楚卑湿,多竹木,故今称板枋多曰川楚云。王义乌《旧志》载有桃花洞板、茅滩溪板,钱桐乡公抄本新则载有马湖、永宁、金峒、叙宁、大渡河、彭水……等板,皆蜀楚产也。询之贾人,今俱绝产,故不复载。”丙子为万历四年(1576),距《芜关榷志》刊刻相隔不过20余年,已是“名山章材十去五六”了。^②

清代中叶芜湖关木材来源进一步缩小。嘉庆《工部则例》只开列了江楚往江宁木簰、徽绍往江宁木簰、江西往江宁苗竹簰和江楚竹木簰筏在芜湖售卖等四项木竹税则。^③即清代来自上游的木竹簰筏主要出自湖广、江西,而江西更多于湖广。如乾隆七年分芜湖关收湖广簰把税银26376两,江西簰把税银95601两,江西为湖广的3.6倍;乾隆八年分收湖广簰把税银28965两,江西簰把税银59984两,江西为湖广的2倍。^④四川输出木材数量不多,这从表4所列渝关实征木税只有5000—7000两即可确认。贵州所产木植顺沅江而下过辰关入长江者,应归入湖广簰把。嘉庆年间已有“木植向多采自黔楚,本年该处木植过关甚少”的奏报;^⑤道光年间,更出现湖广木植“从前过于砍伐,现植之木尚须培养成材始可采取”的现象。^⑥砍伐过度造成的森林资源减少当也是工关税收下降的重要原因。

(二) 粮食

粮食也是经由芜湖关东下的重要商品,包括大豆和稻米两大类。

大豆是芜湖户关的主要税源之一。大豆可榨油磨腐,豆饼用作肥料,江南地区对其需求量很大。雍正年间的奏报称“查自江西沿江一路来有九江、芜湖、龙江三关,俱收江广及川江之运到货税,而芜湖之税额最多,所赖者湖广豆舡之纷集,以益课税。”^⑦乾隆时的记载如“芜湖关户税,油、豆二项约资其半。”^⑧

据安徽巡抚卫哲治奏报“乾隆十六年分户关共收正税盈余二十七万一千三十三两,内有豆税银八万九千三百三十六两五钱六分。今十七年分共收正税盈余银二十五万四千三百七十八两二钱七分,内豆税银六万三千八百六两三钱二分,较上年计少收银二万五千五百三十两二钱四分。其短少缘由实因上年湖广产豆地方收成之时雨水欠匀,豆粒浆水不足,兼多霉烂,商人贩往下江每多折本,是以到关稀少。”^⑨乾隆十六年分征收豆税银89337两,占户税总额的33%;十七年分豆税银63806两,占比25%。芜湖户关《食物税则》中列有,“黄豆、黑豆每担各税四分五厘”,^⑩依此折算,乾隆十六年分芜湖过关大豆198万余担,十七年分为135万担。表7所列是乾隆前期豆税银占户关税收比例和依据税则折算的豆担。

表7 乾隆年间芜湖户关实征、免征豆税银及其折合豆担示例

① 刘洪谟《芜关榷志》卷下,第30—37页。

② 刘洪谟《芜关榷志》卷下,第37页。

③ 嘉庆《工部则例》卷九《关税》,《故宫珍本丛刊》第294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380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乾隆九年七月初七日安庆巡抚范臻奏折。

⑤ 台湾故宫博物院档案:嘉庆元年四月二十一日安徽巡抚张诚基折。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道光十四年三月初一日安徽巡抚邓廷桢折。

⑦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册,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安徽巡抚魏廷珍折,第62页。

⑧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7辑,乾隆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安徽巡抚卫哲治折,第667页。

⑨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7辑,乾隆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安徽巡抚卫哲治折,第667页。

⑩ 乾隆《户部则例》卷七七《税则·芜湖关》,《故宫珍本丛刊》第285册,第268页。

年 分	豆 税 银	户税总额	豆税所占%	折合豆担
乾隆七年分	免征 50 331 两	227 681 两	22.1%	1 118 467 担
乾隆八年分	免征 123 035 两	316 189 两	38.9%	2 734 111 担
乾隆九年分	免征 95 963 两	278 687 两	34.4%	2 132 511 担
乾隆十年分	免征 68 172 两	249 327 两	27.3%	1 514 933 担
乾隆十一年分	免征 107 205 两	308 833 两	34.7%	2 382 333 担
乾隆十四年分	实征 75 448 两	258 098 两	29.2%	1 676 622 担
乾隆十五年分	实征 88 851 两	256 138 两	34.7%	1 974 467 担
乾隆十六年分	实征 89 337 两	271 033 两	33.0%	1 985 267 担
乾隆十七年分	实征 63 806 两	254 378 两	25.1%	1 351 244 担
平 均	84 683 两	268 929 两	31.5%	1 881 844 担

资料来源: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该关税收档案统计。

表 7 可见,豆税在户关税银中所占比例在 20%—40% 之间,是户税的主要来源之一;大豆过关数量则在 110 万—280 万担之间,平均为 188 万担,免税年分相对多些。其中以乾隆八年分为最高,一方面,“楚蜀豆收丰稔,出产既多,价值平减,商贾之贩运者倍增”,“一年之中间有往而销售,复还而再贩者”;另一方面,江南对豆饼肥料需求量大,“霉变之豆亦可应用”,“向以各关征税,霉豆无人贩运,今因免征税银竟有贩来行销,以致过关豆数复倍于昔”。^①该年免征豆税银 123 000 余两,以每担税银四分五厘计,折合大豆 273 万担。不过,芜湖户关税则规定“凡商船货物,满载者分加料、平料、下料三等,按梁头丈尺征收……不满载者按担科税”。^②即按担科税者只是“不满载者”,满载豆船系按照“平料货物减尺科税”。^③一般来说,整船征税比按担计征税率要低,故该年实际过关大豆至少超过 300 万担,常年过关量当也在二三百万担之谱。

芜湖关不征米税,仅工关征收米麦船料,“凡米麦过关止(只)按装载之船身丈尺征收船料银,而并不计石收税”。^④表 8 所列是我们在该关档案中收集到的实征、免征米麦船料税银的记载(见下页)。

表 8 显示,乾隆年间芜湖工关所征米麦船料银高不过数千两,在工关税收中占比不大,最高不过 6.0%。至于过关米粮数量没有具体记载,只能做些估算。档案记载,乾隆五十二年冬“拨运闽米五十万石”经由芜关“船只几近盈千”,^⑤据此推论,二十六年分过关米麦船 1 855 只,载粮当在一百万石左右;该年所征船料银为 2 890 余两,^⑥依此折算,征收船料银最多的二十、二十一年分过关米粮也不过二百余万石。不过,这两个关期免征税银各三四个多月,实际集中在乾隆二十一年二月中旬至八月底,^⑦若将其合并计算,乾隆二十一年全年过关米粮数量可达四五百万担,或者更多些。即便如此,与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乾隆十年三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尹继善折。

②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八八《户部·关税》,《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66 辑第 656 册,第 8667、8672 页。

③ 乾隆《户部则例》卷七七《税则·芜湖关》,《故宫珍本丛刊》第 285 册,第 274 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乾隆十六年五月十三日安徽巡抚张师载折。

⑤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 68 辑,乾隆五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安徽巡抚陈用敷折,第 657 页。

⑥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 18 辑,乾隆二十八年九月初三日两江总督尹继善折,第 828 页。二十七年分比二十六年分少过米麦船 506 只,少收船料银 789.921 两,平均每船征银 1.56 两,以此折算,1 855 只船征银 2 894 两,1 349 只船征银 2 104 两。

⑦ 乾隆二十年江浙二省歉收,二十一年二月十三日乾隆皇帝下旨暂免米豆征税,至九月一日停止;免征的六个多月跨二十、二十一年两个关期,分别免征 79 日和一季 29 日。

以往学者估计的从长江中上游输入江南的稻米每年在 1 000 万—1 500 万石的数量仍有很大差距。^①

表 8 乾隆年间芜湖工关实征、免征米麦船料税银示例

年 分	工税总额	米麦船料银	占工税%	备 注
乾隆六年分	161 827 两	免征 5 141 两	3.2	
乾隆七年分	127 117 两	免征 3 124 两	2.5	
乾隆八年分	119 708 两	免征 2 084 两	1.7	
乾隆九年分	143 353 两	免征 2 286 两	1.6	
乾隆十年分	144 279 两	免征 615 两	0.4	
乾隆十一年分	141 193 两	免征 953 两	0.7	
乾隆十三年分	126 378 两	实征 3 261 两	2.6	两季 16 日实征米税银
乾隆十四年分	126 506 两	实征 2 881 两	2.3	
乾隆十五年分	141 286 两	实征 1 137 两	0.8	
乾隆十六年分	141 994 两	实征 2 335 两	1.6	
乾隆二十年分	133 737 两	免征 6 139 两	4.6	79 日免征税额
乾隆二十一年分	101 887 两	免征 6 134 两	6.0	一季 29 日免征税额
乾隆二十六年分	133 959 两	实征 2 894 两*	2.2	过关米麦船 1 855 只
乾隆二十七年分	133 261 两	实征 2 104 两**	1.6	过关米麦船 1 349 只

资料来源: 同表 7。*** 乾隆二十六、二十七年分船料银系折算数字。

九江关位于芜湖上游,也是长江中上游米谷输往江南的转运枢纽。一般来说,由九江东下的米粮须经过芜湖才能抵达江南。九江关也不征米税,只征船料。据该关档案,乾隆三年江广岁熟,“米价不过九钱、一两不等”,而江浙等省歉收,米价每石售至一两五六钱,商人“贩米一石可获利三四钱”,故贩卖者多,自乾隆三年八月十七日起至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止,八个月零十日过关船只达 53 032 只,征收船料银 312 934 两零。^②表 9 所列为乾隆中叶九江关过关船只及其征收船料银示例。

表 9 乾隆年间九江关过关船只及征收船料银示例

年 分	过关船只	征收船料银	船料占该关税额的%
二十二年分	49 491 只	230 099 两	53.3%
二十三年分	513 50 只	212 783 两	50.7%
二十五年分	61 485 只	225 176 两	54.6%
二十六年分	44 833 只	151 167 两	38.4%
三十年分	48 968 只	163 044 两	40.9%
三十一年分	47 989 只	155 848 两	40.0%

资料来源: 许檀《清代前期的九江关及其商品流通》。

上表可见,乾隆中叶九江关每年过关船只在 4 万—6 万只,这些船只即便不是全都运米,但其占比很大是可以肯定的。而芜湖过关米船不过数千,经由九江关东下的大量米船似并未经过芜湖关,那么这些粮食到哪里去了呢? 我们从文献资料中找到了一些踪迹:

- ① 全汉升《清朝中叶苏州的米粮贸易》,《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 年,第 573 页;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第 256—258 页;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66 页;王业键:Secular Trends of Rice Prices in the Yangzi Delta, 1638—1935,《清代经济史论文集(三)》,台北:稻香出版社,2003 年,第 287 页;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348—349 页。
-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钞档·江西各关》:乾隆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户部尚书徐本等题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乾隆七年六月十八日江西巡抚陈弘谋折。

如雍正五年安徽巡抚奏报“今年夏秋江水长(涨)发,港汊处处相通,商船自上流由曲汊小河多直抵庐、凤,可以不由芜湖……所以芜湖(收税)甚少,而凤阳独多。”^①看来,从九江东下的米船有一部分经由支流水道转往皖北的凤阳等府。又如,乾隆十四年安徽巡抚卫哲治奏称,“芜湖一关滨临大江,支河岐路甚属繁多,客货易于私运偷越”;^②嘉庆二十年江苏巡抚张师载奏称“所有川、楚米船自长江直下者,或即于安徽一路就近销售。”^③皖南的池州、宁国、徽州等府均有部分州县缺粮,由长江东下的米粮当会有一部分转销这一地区。即便如此,仍不足以解释芜湖过关米船与九江关的悬殊差距,只能暂且存疑。

(三) 棉布

棉布是经由芜湖户关西行的大宗商品,主要来自江南。明代的记载称,江南布匹“溯淮而北走齐鲁之郊,仰给京师,达于九边,以清源为绾毂;出长江之口,经楚蜀而散于闽粤秦晋滇黔诸郡国,以芜关为绾毂”。^④芜湖是江南棉布输往长江中上游湖广、四川以及滇黔等地的转运枢纽。清代依然如此,档案记载,“芜湖户关全赖上江油、豆、杂货,下江布疋、棉花等税”。乾隆三十五年分因“黄豆、棉花、布疋到关稀少”,以致户税较三十三年分短少税银 26 800 余两。^⑤道光十三年分是户关税收最少的一年,仅征银 155 500 两,不仅“钦定盈余”73 000 两全数无征,且短缺“正额”1 400 余两。安徽巡抚邓廷桢奏报其原因称“该关户税以木棉、布疋为大宗”,“近年以来频遭歉岁,小民艰于糊口,无暇谋及衣襦,棉布因而滞销,商贾无从转运”,以致税收缺额甚多。^⑥该年工关税银也因“岁歉民贫,商绌货稀”缺额 37 700 余两,户、工二关共短征税银 112 100 余两,为乾嘉道三朝税收最低的一年。

苏州洞庭商人是活跃在长江中游的重要布商之一。明末清初顾炎武有言:洞庭人“稍有资蓄则商贩荆襄,涉水不避险阻”。^⑦康熙年间《林屋民风》记载:洞庭民俗“商贩谋生不远千里,荆湖之地竟为吾乡之都会,而川蜀、两广之间往来亦不乏人”。其经营行业以米粮、绸布为主,“上水则紬缎布疋,下水惟米而已”。^⑧据范金民先生研究,洞庭东山万氏、西山秦氏、徐氏、邓氏、蒋氏、沈氏、孙氏等商人家族都曾活跃在长江中游地区。如万氏家族,明代景泰年间即已“客游荆襄”“货累饶裕”,其子孙辈也多贸易于“楚湘泽间”,以嘉万时为最盛;徐氏家族在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的数百年间,世代有人经商往来于长沙、汉口、荆襄一带,以乾隆年间为鼎盛。这些商人将苏松绸布经由芜湖、汉口销往长江中上游地区,而由湖广贩粮东下。汉口的布店大多高揭苏松布匹的市招,以招徕客商。^⑨

芜湖不仅是棉布转运枢纽,也是棉布的加工中心,所谓“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⑩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布青初尚芜湖,千百年矣,以其浆碾成青光,边方外国皆贵重之”;“毛青乃出近代,其法取松江美布染成深青……此布一时重用。”^⑪嘉靖年间徽商阮弼抓住这一商机,在芜湖开设染局,“召染人曹治之”,以至“五方购者益集,其所转毂遍于吴越、荆梁、燕豫、齐鲁之间,则又分局而贾要

①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一册,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安徽巡抚魏廷珍折,第 61—62 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乾隆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安徽巡抚卫哲治折。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嘉庆二十年十月十四日江苏巡抚张师载折,转引自廖声丰《清代常关与区域经济研究》,第 239 页。

④ 陈继儒《陈眉公全集》卷五九《布税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崇祯刻本,第 21 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初七日两江总督高晋折。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道光十四年三月初一日安徽巡抚邓廷桢折。

⑦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苏州备录下·西洞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538 页。

⑧ 王维德《林屋民风》卷七《民风》,康熙五十二年刻本,《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 239 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 年,第 444 页。

⑨ 范金民《明清洞庭商人家族》,《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五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 222—230 页。

⑩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乃服第二·布衣》,管巧灵、谭属春点校本,长沙:岳麓书社,2002 年,第 63 页。

⑪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彰施第三·诸色质料》,第 96—97 页。

津”^①商业规模日益扩大。

芜湖周边各县也产棉布,如当涂县“女红多事纺绩,……初夏种木棉,秋撮其花,纺纱织布”;^②繁昌布“幅阔而厚,虽不及苏松之精密,而裁为袍服,亦颇耐久;冻绿,尤广行他省”;^③无为州“乡之南多植木棉,纺绩成布,较他邑为差佳”;^④合肥县“布,西乡者佳”。^⑤芜湖关《税则》中,梭布、紫花布、松江颜色细布、崇明布等来自江南,而“本关土著色布”^⑥当系周边各州县所产。此外,汉口市场上有“来自苏州、松江”的布匹,来自江宁、苏州、杭州、湖州”的各色丝织品,^⑦当也是经由芜湖关而至。

(四) 其他

桐油、纸张、棉花、烟叶、瓷器、铁器等也是经由芜湖户关流通的较大宗的商品。乾隆年间的档案记有“芜湖一关每年户税全赖江楚出产之油、豆、纸、铁及瓷器、铅、锡等货”;^⑧道光年间的奏报言“芜湖关户税以油、豆、木棉、布匹为大宗,烟叶、纸张次之”。^⑨

芜湖户关“油、豆二项约资其半”,这里的油当指桐油,亦或也包括茶油、菜油。江西、湖广均产桐油,方志记载“茶、桐二油惟赣产佳,每岁贾人贩之他省,不可胜计,故两关之舟载运者络绎不绝”。^⑩湖南郴州“沿河一带设立大店、栈户数十间……九十月间取茶、桐油,行旅客商络绎不绝。”^⑪档案记载“赣南所属各邑山场多栽桐、梓二木,秋成收取其实榨出油斤,系赣关上游土产,每年江浙客商前来贩买。”^⑫乾隆二年分芜湖关因“上游所产油、豆丰稔,下江市价稍昂,商贾乐于趋贩”,共征收税银425 900余两,较上届多收78 400余两;^⑬乾隆十三年分则比上届少收税银26 600余两,其短收原因,“该年产油地方油子收成歉薄,价值高昂,往年贻本可置油千担者,该年仅可置五六百担,是以过关油税倍少于上届。及查芜邑并下江各处香、桐油价比昔倍增,可为出产歉少之明验”。^⑭

钢铁为芜湖名产,《县志》记载“芜工人素朴拙,无他技巧……惟铁工为异于他县。居市廛冶钢业者数十家,每日须工作,不啻数百人”,其产品“囊束而授之客,走天下不訾也。”^⑮又,“钢有数种,寸钢为最”,又有铁花灯、铁花屏风等。^⑯嘉庆初年芜湖经营钢铁的铺户有葛永泰、马万盛、程道盛、吴豫泰、程立泰、陈奎泰、程时金、邢怡泰、濮万兴、王时和、陈元泰、程顺兴、葛通顺、陈祥泰、吴源全、陈京祥、吴启发、陈茂源等18家。^⑰

在芜湖关《税则》“原册”中,铁货类商品列有生铁、生铁盆、铁罐、铁钹、红土、熟铁、钉钹、钢、铁砂、土砂、废铁、铁渣等12项,所谓“原册”可能是崇祯年间设立户关之时或清初所定。乾隆年间修订的《税则》对铁货进行了细分,在《用物税则》的“铁器”项下列有:石耳锅、锯铁条、熟铁器、铁针、铁锚、生铁锅、生铁铤、生铁盆、铁钹、铁锅、铁火炉、铁罐、铁暖锅等,在《杂货税则》的“铜铅铁锡杂货”项

① 汪道昆《太函集》卷三五《明赐级阮长公传》,胡益民、于国庆点校本,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763页。

② 乾隆《当涂县志》卷七《风俗》,国家图书馆藏本,第2页。

③ 康熙《繁昌县志》卷五《物产》,康熙十四年刻本,第33页。

④ 嘉庆《无为州志》卷八《食货志·物产》,国家图书馆藏本,第23页。

⑤ 嘉庆《合肥县志》卷八《风土志·土产》,国家图书馆藏本,第6页。

⑥ 乾隆《户部则例》卷七七《税则·芜湖关》,《故宫珍本丛刊》第285册,第269页。

⑦ 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卷一《食货考》,郭康松点校本,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5—36页。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乾隆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庆巡抚范璨折。

⑨ 台湾故宫博物院档案: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七日安徽巡抚程琳采折。

⑩ 乾隆《赣州府志》卷二《物产》,国家图书馆藏本,第50页。

⑪ 嘉庆《郴州总志》卷二一《风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05页。

⑫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乾隆九年七月初五日两江总督尹继善折。

⑬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乾隆三年五月初九日安徽巡抚赵国麟折。

⑭ 台湾故宫博物院档案:乾隆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安徽巡抚卫哲治折。

⑮ 嘉庆《芜湖县志》卷一《地理志·风俗》,国家图书馆藏民国二年重印本,第18页。

⑯ 嘉庆《芜湖县志》卷五《物产志》,国家图书馆藏民国二年重印本,第5—6页。

⑰ 嘉庆《芜湖县志》卷二一《艺文志》,宋铨《贩运铜觔章程》,国家图书馆藏民国二年重印本,第21页。

下列有: 钢丝、铁丝、铁砂、铁钼、熟铁、废铁、生铁、铁渣等项,^①增加了不少品种。显然, 乾隆年间经由芜湖关流通的铁制品比明末清初有较大增长, 其中当有一部分为芜湖所产。

茶叶是安徽重要的经济作物, 也是徽商经营的四大行业之一, 徽州、宁国、六安、太平等府州都是茶叶产区。顺治年间户部主事唐稷在当涂县设立金柱税口, 即是防止宣城所产茶叶等货由黄池出采石, 而“不赴芜(关)报税”。^②他如瓷器、纸张、棉花、烟、酒等也是经由芜湖关的重要商品。如乾隆十三年分, 芜湖户关不仅“油税倍少于上届”, 而且“瓷器、纸、铁等货”也少于上年, 以至户关仅征银 201 900 余两, 为乾隆朝之最低额。^③乾隆三十五年分, 芜湖户税中“花、豆、布疋、杂货、瓷器等项”较三十三年少收银 32 000 余两, 而“纸张、烟、酒等税则较三十三年尚多银一万五千四百余两”, 故税收不至缺额。^④乾隆五十二年分, 因“上年下江棉花, 上江烟叶、桐油出产地收成歉薄, 到关稀少”, 征收盈余银较上年短少 17 900 余两。^⑤

三、结 语

芜湖关包括户、工二关, 户关征收百货税, 工关征收竹木税。工关设于成化七年, 税额最初仅 4 000 两, 正德十年突破 4 万两, 嘉靖一万历年间实征银多在 2 万—4 万两, 最高曾达 5 万余两; 清代工关税额不断增长, 乾隆一道光年间实征为 10 万—14 万两, 最高达 17 万两。户关于崇祯三年正式设立, 定税额 3 万两, 清初增至 8 万余两, 清代中叶实征为 22 万—25 万两, 最高曾达 31 万余两。

清代芜湖关税额以乾隆十一年分为最高, 曾达到 45 万两, 此后逐渐下降。乾隆前期的三十年实征税额在 35 万—45 万两之间; 乾隆后期至嘉庆末的五十余年相对平稳, 大体保持在 35 万两左右; 道光年间又有下降, 但仍在 30 万两以上。芜湖关税额在长江沿线各关中仅次于九江关, 位居第二, 远高于其他各关。

经由芜湖关流通的商品以竹木、粮食为最大宗, 其次为棉布、棉花、桐油、纸张、烟叶、茶叶、瓷器、铁器等。

来自长江中上游各省的竹木簰把是工关税源之最大宗, 竹木税在工关税收中所占比例达 60%—80%。不过, 清代中叶的百余年间, 竹木簰把到关数量持续下降, 从乾隆前期的七八百、五六百宗降至道光年间的百余宗, 其税额也呈下降趋势。除气候条件、年景丰歉、运销状况等短期因素的影响之外, 因砍伐过度导致的上游各省森林资源的减少当也是重要原因。

粮食也是经由芜湖关东下的大宗商品, 其中大豆占有很大比重。依据芜湖户关实征、免征豆税银折算, 每年过关大豆至少有二百万石, 在户关税收中占比达 20%—40%, 这是我们以往未予充分注意的。^⑥另外, 依据工关米船料税银折算, 每年经由芜湖关输往江南的米粮数量最多不过四五百万石, 远不及以往的估计; 从九江过关的大量米船似并未经由芜湖关东下, 关于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察。

(责任编辑: 樊延明)

① 乾隆《户部则例》卷七七《税则·芜湖关》,《故宫珍本丛刊》第 285 册,第 267 页。

② 康熙《太平府志》卷一二《田赋下·关税》,国家图书馆藏光绪二十九年重印本,第 21 页。

③ 台湾故宫博物院档案: 乾隆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安徽巡抚卫哲治折。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 乾隆三十六年三月初九日安徽巡抚裴宗锡折。

⑤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 64 辑,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安徽巡抚书麟折,第 685 页。

⑥ 笔者仅见日本学者香坂昌纪《清代における大運河の物流流通》一文估计乾隆前期芜湖关每年过关豆货 200 万石,其中一部分经浒墅关抵达苏州。《东北学院大学论集·历史学地理学》第 15 号,1985 年。